

詔

密

學

賢

文

獻

學

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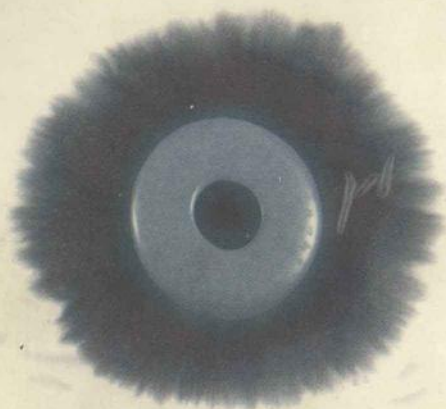
究

論

集

李葆嘉◎主編

引玉集



引玉集

——语言学与文献学研究论集

李葆嘉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图书编目数据

引玉集:语言学与文献学研究论集 / 李葆嘉主编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0,1

准引证号:苏出准印 JSE-002593

I. 引…

II. 李…

III. 语言学—文献学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印行

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承印

(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开本:850 * 1169 印张:24 字数:600 千字

2000 年 1 月印刷 印数:1—500 册

工本费:40 元

前 言

根据人类学家的见解——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类和现代文化。这一“现代”，不是指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或 20 世纪的“现代”，而是指人类进化史上的“现代”即从距今 3.5 万年之际开始的“现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人性”就是人的感受性和语言性（语言性也是一种感受性，即感受的语言符号结构化。只是为了与非语言符号感受性相区别，才把最具有理性的这种语言感受性独立出来），所谓“世界”就是感受和语言的世界，所谓“认知世界观”首先表现为语言的世界观。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方式、文化形态、交际工具和符号系统。语言的成熟使人类实现了从自然界动物向社会性动物的彻底转变，从体质上的现代人类突变为心智上的现代人类。迄今为止，在现代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发生过五次重大的信息革命：第一次是距今 3.5 万年前的现代语言的成熟，第二次是距今 6000 年前的文字的产生（苏美尔文字），第三次是印刷术的发明（10 世纪，中国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铁板式印刷术，惜元明清通行的仍然是雕版印刷；15 世纪，德国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压榨机式印刷，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进展引起世界性印刷技术革命），第四次是 19 世纪的无线电报的出现，第五次是 20 世纪的网络技术的革命（所谓

“数字化生存”)。

在人类文明史上,语言文字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核心位置,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人类文明结晶就是文献。语言是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虽然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文字,但不可以没有语言,然而,一个文明社会却不可以没有文字。既然人类历史的划界以文字的出现作为“史前”和“史后”的准绳,那么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就是文字的诞生。同样,只有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下来的系统知识才形成学科。历史提醒我们:对语言自发分析形成的原初语言文字学是人类最早的原初学科,它比号称“学科之母”的哲学要早几千年、几百年降临人世。在古代社会,语言文字学的地位显赫,许慎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在现当代社会,语言文字学仍然是一门显学,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作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底座的语言学,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重创语言学方法的同时,其研究方法渗透诸多学科。可以与生物进化论相媲美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远远早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根据施莱歇尔的自述,他所创立的谱系树模式接受了达尔文理论的启发),一直是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骄傲。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众所周知。50年代的“乔姆斯基革命”,推动了计算机学和心理学的發展。至于语言论美学狂飙突进百年,语言哲学在西方成为主流哲学,更是世界学术史上不争的事实。

不同的语言类型与个性特征制约着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的自发形成。就世界范围来说,语言学研究具有四个古老的传统:1、以腓尼基字母表为起点的重在音素学分析的闪含语言学传统;2、以希腊特拉克斯《语法术》为标志的重在形态学的西欧语言学传统;3、以巴尼尼《梵语语法》为标志的构形和语音分析并重的印度语言学传统;4、以《尔雅》和《说文解字》为标志的重在语义阐释的中国

语言学传统。前三种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屈折语,形态变化提供了裸露线索;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孤立语,实字语义和虚字功能义先后成为研究的关键。随着文化接触,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必然相互借鉴交融。在公元前,由于地域相连且以字母的流传为线索,闪含语言学传统和欧洲语言学传统早已逐步合流。19世纪,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印欧语系的建立和谱系树模式的创立为成果,实现了印度语言学传统和欧洲语言学传统的完美合流。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重在“强国智民”的《马氏文通》的诞生为标志,东西方语言学合流的序幕徐徐拉开。

由于东西方语言的类型差别,经过一个世纪的撞击和尝试,汉语传统方法和西方现代理论仍然未能全面融会贯通。回顾20世纪的中国语法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大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上半叶50年,其主流是以模仿和引进西方语法学框架处理汉语语言事实的马建忠传统和叶斯柏森“三品说”的影响,倡导依据汉语事实建立汉语语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文法革新讨论”只是一股“前卫”的支派。中间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其主流是规范语言学的主流和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渗透,同时也引发了汉语语法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和困惑。后一阶段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近20年,在世界变成“地球村”和中国走向国际的宏观背景之下,反思和重建汉语语法学的理论和方法成为热点。以文化语言学的异军突起为标志,到90年代终于形成了传统语法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义研究理论、三个平面理论、配价语法理论、功能语法理论、格语法理论、字本位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等百花齐放的格局,实现了研究理论和方法从一统到多元的历史性转折。这一转折体现了当代整个学术潮流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宽容性和“思想多元”价值观。

20世界的欧美语言学,“乔姆斯基革命”将其一分为二。上半叶的主流是强调语言是符号系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与之对峙的

是强调语言是社会行为的英国功能语言学和强调语言是文化形态的美国人类语言学。下半叶的主流是强调语言是先天机制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与之对峙的是强调语言具有社团性的社会语言学和重在实践性的应用语言学。面对当代“多维立体语言学”(姑且称之)全面超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现状,语言和言语、内部和外部、静态与动态、描写和阐释、形式和实体的人为疆域全面消解。任何一种语言学流派,都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学术潮流息息相通;任何一种语言学方法,都有其哲学基础或借鉴来源。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交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事实。人类语言学史上从来没有什么“纯正语言学”,除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硬要把19世纪以前的文献语言学打为“语文学”,结构主义共时语言学硬要把历史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硬要把结构主义语言学说成不是“真正的语言学”以标新立异。古希腊语言学一开始就接受了哲学(关于名实之争)和逻辑学(主宾语句法范畴源于此)的影响。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中有什么“纯正”或“原创性”语言学方法,那么可能只有依据形态手段或词法范畴的词类划分法,而形态变化是祖先对世界的认知烙在语言上的古老印记,因此与原始思维息息相关。号称“内部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也并不那么“纯正”,它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就是法国社会心理学,苏俄语言学界一向都把索绪尔语言学归入社会心理学派,此外索绪尔还吸收了瑞士经济学派的观点。被称之为外部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在创立者拉波夫看来是地地道道的“本体语言学”。根据认知心理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种,语言是人类认知内容的一种符号化建构。恪守临摹性原则是语言符号和符号组配结构的基本原则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进一步表明了语言的内部和外部的绝对划分完全是人为的。有谁能说“人类语言学”不是本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同样如此。所谓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关键是对语言性质的认定和研究方法的改变,研究对象仍然是“语言”这一事实并

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都是本体语言学;从研究方法的借鉴来看,都是交叉语言学。英国功能语言学接受了人类学的影响,转换生成语言学借助于数学和逻辑学方法,三个平面的理论模仿符号学系统,配价语法的灵感来自化学分析。毋庸置疑,语言学有自己的系统理论和学科方法,但是同样不可否认,语言学的发展必须接受与其他学科撞击的灵感,把别的学科方法转化为语言学研究方法。真正属于内容交叉性研究的,应当是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心理的关系研究。

语言学发展到今天,任何有价值的“本体性”研究都离不开借鉴性方法和跨学科观照。对语言性质认定的不同倾向,导致了语言学研究在当今和未来呈现四大主要走向。第一,认定语言性质是交际工具、以研究语言功能为目标的语言教学研究。随着经济、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的“世界化进程”,语言的世界化进程也同样不可避免,事关国家形象和未来位置的对外语言教学将日益扩大。语言教学需要新的理论模式,必须在语言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建构“语言·文化·心理”的系统模式。第二,认定语言性质是符号系统、以研究语言机制为目标的语言微机处理研究。将人脑语言机制通过数字化程序移植进电脑,“智能机”的研制成为真正的跨世纪工程。以电脑模式“仿生”人脑模式,语法的形式化研究必然导向语义的形式化研究(甚至应当进一步包括心理结构形式化),并成为当务之急。第三,认定语言性质是文化形态、以研究语言价值为目标的语言多维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勃发触动了一系列边缘语言学学科的诞生和复兴,交叉性研究的天地充满勃勃生机。第四,以世界语言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理论抽象为研究手段的宏观语言学研究。随着对个别语言、区域语言和全球语言研究的量的扩展和质的深入,历史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或民族语言学的内容和理论将不断更新。以往的“普通语言学”,主要是建立在印欧系语言事实以及研究成果较为多的一些语种事实的基础之上,

其实并不够“普通”。虽然,并不要求也不可能在给为每一语种建立个别语言学以后,再去建构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但是对之应当采取层级建构方式:首先建立一些重要的个别语言学,其次以此为基础建立某一结构类型的语言学(比如屈折语语言学、粘着语语言学、孤立语语言学、复综语语言学)和某一关系类型的语言学(比如语系语言学、语区语言学、语网语言学、语珠语言学),然后在语言地理学、语言年代学和语言演变学的理论之上,参照考古学、遗传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符号学、数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最终建构“世界宏观语言学”或“哲学论语言学”(“语言哲学”是一个歧义结构,为了明确区别,我把以哲学为本体的称之为“语言论哲学”,以语言学为本体的称之为“哲学论语言学”)。

随着以数学化、逻辑化为手段的纯形式化研究目标的受挫而不得不引进语义研究的乔姆斯基革命的转向,语形的形式化和语义的形式化成为双重目标,语形型语言研究方法和语义型语言研究方法的世界性合流不可避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语言学,有着训诂学(以先秦《尔雅》为滥觞)、比较词汇学(以西汉扬雄《方言》为发端)、文字学(以东汉许慎《说文》为集成)、语源学(以东汉刘熙《释名》为楷模)、音韵学(以隋代陆法言《切韵》为枢纽)和虚字学(以元代卢以纬《语助》为首篇)研究的六个系列,其中以唐宋等韵学为理论(比西方现代音位学理论早近千年)、以清代古音学为高峰(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双峰对峙)、后来居上的汉语音韵学就是历史上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多次撞击交融的结晶。20世纪以来,古今汉语和周边民族语言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古代汉语学(按学科可再分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按阶段可再分为原始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现代汉语学(汉字学、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六大板

块。古今汉语研究的打通、汉语与民族语言研究的沟通、语言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沟通,为中国语言史的重建和东方理论语言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从具有学科建设、文化交流和
社会功能三大价值的《马氏文通》诞生以来,中国语言学经历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百年困惑和长久反思,伴随着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的崛起,在中国传统方法和西方现代理论的交融中,在古代汉语研究和现代汉语研究的贯通中,在历史汉语研究与民族语言研究的互动中,坚持微观描写与宏观阐释的循环往复,坚持理论探索和应用操作的相辅相成,可望为丰富 21 世纪的世界语言学宝库做出新的贡献。

在千纪之交的“世界化进程”(所谓“现代化”其实质就是“世界化”)和中国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之下,在南京师范大学加强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文学院领导着眼长远、权衡全局,近年来把语言类学科建设放在首要位置,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其蓬勃发展。为了反映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以及“文献学”学科的科研概貌和特色,以进一步扩大学术交流,促进语言教学和研究,文学院委托李葆嘉负责编印《语言学与文献学研究论集》。

这本论集收录了近年来“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古典文献学”学科教师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求重点突出、门类兼备,采取分别部居、以类相从。编辑工作大致按照以下思路操作:1、选文原则,以“汉语言文字学”为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文献学”次之。2、编排方式,(1)学科门类次序:先通论后分科、先微观再理论,以中国语言史、汉语语法学、汉语词汇学、汉语文字学、汉语音韵学、汉语训诂学、汉语方言学、汉语文献学、理论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哲学为序;(2)学科内部次序:先古代后现代,先内核后边缘,连类而及。3、选文篇目,由于研究方向和专攻兴趣各有异同,各学科和各同人的选文篇数和篇幅难以强求

平均,其中“汉语言文字学”论文 28 篇,“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论文 10 篇,“汉语文献学”论文 5 篇,总 43 篇为一集。4、体例统一,编辑过程中对选文的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和文字删改,同时在选文后附作者简介。

忝列主编,是以明责。“抛砖”之作,以求“引玉”。敬祈海内外同道不吝赐教!

后学 李葆嘉 谨识

千纪之交于随园

目 录

前 言

中国语言史

- 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 李葆嘉(1)
汉语的祖先:回溯和前瞻…………… 【美】王士元著 李葆嘉译(38)

汉语语法学

- 论《马氏文通》语法观…………… 韩陈其(49)
论“所”字结构…………… 韩陈其(77)
敦煌俗语法之句法研究…………… 黄 征(97)
“把”字句的情状类型及其语法特征…………… 王政红(113)
名形语素构词格分析…………… 王政红(126)
论离合词…………… 段业辉(137)
论副词的语义制约…………… 段业辉(148)

汉语词汇学

- 汉译佛经与后汉词语例释…………… 何亚南(160)
中古汉语词汇通释两则…………… 何亚南(167)
唐代俗词语辑释(二)…………… 黄 征(174)
敦煌变文语词校释札记…………… 施谢捷(188)
试论汉语俗语词的几个问题…………… 黄 征(200)
论近代汉语后缀形容词…………… 张美兰(230)

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	沈孟璎(257)
再谈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	沈孟璎(269)
略论现代汉语多义词的语义体系·····	王政红(279)
亲属称谓在非亲属交往中的运用·····	潘 文(289)
生肖喻称谓语的文化阐释·····	赵家新(298)
汉语詈语的文化蕴含·····	尹 群(311)

汉语文字学

古玺印文字丛考(十篇)·····	施谢捷(319)
汉字的羡余现象研究·····	韩陈其(338)
论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	李葆嘉(354)
论现代高等书法教育中的审美趋同心理·····	陈仲明(369)

汉语音韵学

论清代上古声纽研究·····	李葆嘉(378)
《广韵》大韵韵目与小韵韵目之字同切异考·····	李葆嘉(401)

汉语训诂学

《说文》段注求证本义的方法·····	马景仑(413)
《说文》段注对“反训”的阐释·····	马景仑(423)
贾谊《新书》难点诂释·····	方向东(433)

汉语方言学

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	刘俐李(439)
江苏方言文化论·····	李葆嘉(459)

汉语文献学

评帛书《易经》研究的两种倾向·····	方向东(482)
论孔子作《春秋》·····	赵生群(493)

论《左传》无经之传·····	赵生群(524)
《文选》五臣注平议·····	江庆柏(560)
周德清《中原音韵》的曲学研究·····	陆 林(572)

理论语言学

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	李葆嘉(594)
中国混合语的研究现状与理论探索·····	李葆嘉(608)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研究·····	李葆嘉(628)
现代语言起源的化石考古学与生物分子学思考·····	李葆嘉(667)
语言关系类型学:对谱系树理论的超越 ·····	李葆嘉(681)

语言文化哲学

论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	李葆嘉(702)
----------------------	----------

后 记

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

——七千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

李葆嘉

内容提要

本文贯通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以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为基础,以南耕北牧的文明冲突交融为背景,对七千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本文认为:(1)B.C.5000 年左右中国境内形成三大太古语系。(2)B.C. 第三千纪黄帝进居中原,为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提供了历史契机。(3)华夏文明和华夏语历三代而成熟;周代文献语言是氐羌化的华夏书面语。(4)秦汉以后,汉语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经历了两次由(西安)迁东(汴洛)再移南(南京)的巨大变迁。(5)明清官话是以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江淮话为基础方言,以白话小说为语法楷模的通行语,它是江南商业经济与市民社会的产物。(6)作为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内核华夏汉语,在同化影响周边语言的过程中也异化了自己。

一、引言

中国汉语可分为广义与狭义。狭义的汉语指秦汉以后的汉人

语言,以 B.C.206 年(汉王朝建立)为上限,至今约有 2200 年。

由周秦上溯至黄帝进居中原(约 B.C. 第三千纪)其间约 2800 年的语言为华夏语。华夏语又可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五帝时代(约 B.C.3000 年—约 B.C.2200 年)和夏代(约 B.C.2100 年—约 B.C.1700 年)为原始华夏语阶段;商代(约 B.C.1700 年—约 B.C.1100 年)和周代(约 B.C.1100 年—B.C. 三世纪)为商周华夏语阶段,因其语言表层不同,又可分别称之为夷商语和姜周语。

广义汉语包括华夏语和(狭义)汉语,或合称为华夏汉语。中华 5000 年文明史,即有相应的 5000 年华夏汉语史。

距今 7000 年左右,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大致形成。在 B.C.5000 年到 B.C.3000 年之间,对于这些远古先民所使用的语言,可以称之为中国太古语或东亚太古语。依据考古文化系统命名法,太古语可分别称之为青莲岗语(系)、仰韶语(系)与北方语(系)、或依据见于中国古代文献的古代民族系统命名,可分别称之为太古夷越语(系)、太古氐羌语(系)与太古胡猃语(系)。或依据现代语言谱系命名,可分别称之为太古南方(南岛—南亚)语(系)、太古藏缅语(系)与太古阿尔泰语(系)。所谓 7000 年中国语史,即指太古语、华夏语和汉语的生生不息。

根据文献语言材料,从周代开始,华夏汉语始终有一主导语言系统,即官场、文学或商用通行语。周秦为“雅言”,西汉为“通语”,东汉魏晋为“洛生咏”,南朝为“吴音”,隋唐为“汉音”或“秦音”,宋元为“中原正音”或“中原雅音”,明清为“官话”、“官语”或“官音”。其中“雅言”、“通语”、“秦音”的基础音系是历史上的西安音,“洛生咏”、“正音”的基础音系是历史上的汴洛音,“吴音”、“官话”的基础音系是历史上的南京音。秦汉以后,汉语主导音系的变迁轨迹经历了西安音→汴洛音→南京音,又西安音→汴洛音→南京音的周而复始。而汴洛音是西安音在中原的后裔,南京音又是汴洛音在江淮的发展。至于清代末叶至本世纪逐渐上升为主导音系的北京

音,则是明初迁往北京的江淮话(以南京话为代表)在北方的演变结果。换言之,近现代北京音是南京音在北方的后裔。

本文宏观探讨华夏汉语的历史和历史的华夏汉语,溯源至中国太古语,以阐明 7000 年来中国语言之演变大势。进而提出“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之假说,全景鸟瞰东亚—南洋诸语言(阿尔泰语·藏缅语·华夏汉语·苗瑶语·南亚语·侗台语·南岛语)的演变大势。

二、人类有声分节语言的形成与东亚语言的发生

根据印象,人们往往以为人类语言(指有声分节语言)即使不与猿人进化为智人的历史同样久远,至少也有相当漫长的历史。尽管最近美国科学家 Rebecca L·Cam 等人依据生物分子学的研究,提出了现代智人都是由东非同一小聚落的共同祖先,在大约 12 万年之前向全球扩散而来,因此与各地原有的直立人并不相干的“夏娃理论”,即把现代智人的出现限定在距今 12 万年之际,同样,人类语言的出现也不会早于此时。但是,一些人类学家却早就把人类祖先具有语言的年代推到几十万年之前(裴文中 1964),甚至对生活在距今 30 万年之前的北京猿人的语言状况做了绘声绘色的描写(贾兰坡 1982)。其实,这是想当然的“误会”。生活在 30 万年前的猿人尚未完全直立,咽腔尚未形成,从何谈得上用有声分节语言进行交际。遗憾的是,一些语言学研究者不仅陷入了这种“误会”,甚至认为“原始中国语的诞生也不可能迟于 180 万年”(刘民钢 1994),滑向了虚无飘渺的臆说。

虽然“语言起源于劳动说”提示了语言起源的社会条件,“语言与思维同时起源说”指出了语言与思维的交互作用,然而,这些蒙上了浓重的思辨色彩的探讨,除了诱导人们把人类语言的“诞生”时间随心所欲地上推之外,还有着共同的盲点:忽视了有声分